

浅析近代中日间的语言交流

◎秦雅薇

摘要：本文中笔者以近代历史为背景，简述中日间汉字的交流现象，将重点置于20世纪20—50年代间语言的在中日间的交流以及词义的变化。举例叙述了“番号”“工作”等词的词史和语义范围，有助于我们中日间语言交流、文化繁荣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番号 工作 交流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隔海相望。自古以来，由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的发达与强盛，中国一直向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以及越南等国家输出语言与文化。在广袤的东亚大地上，汉字是通用的官方文字和国际文字，自然而然地这些知识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由汉字传播。在汉文化强有力的主导之下，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应运而生。

中国和日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份子，两国语言中都包含大量的汉字。有一部分汉字词，它们同时存在于两种语言之中，被称为“中日同形词”。有些汉字词是中日同形同义，有些则是中日同形异义。为什么有些词词义一致，而为什么有些词词义会不同呢？它们为什么会不同？再常见不过的汉字词究竟从哪里来？是中国创造的还是日本创造的？又是怎样传播、定着的？

语言词汇的产生和交流受到时代与时代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中日同形词”的中日间词意差的产生可能与交流传播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有密切联系。

实际上，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汉语接受了大量的日本制造的汉字词。“至五四运动前后，汉语的言文一致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接受日本词语也告一段落。在这之后，日语词汇的流入成为个别现象，主要有三种：一、军事的语言交流。这种词语受语境影响较大，如‘工事、番号’等都只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二、东北地区的‘协和语’。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混种语（pidgin），已经逐渐消失；三、晚近的日本词语。1949年以后，日语的流入绝无仅有，‘献血’是为数不多的词语中的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大量的日

语新词流入汉语。”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着眼于上述第一类“时局语”。本文讨论的中日时局语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受时局影响产生的一些新词，或是被赋予了新词义的旧词。它们是流行词的一部分，这种词的特点是受时局影响大，以军事用语为主，词义时常发生变化。

本文将举例浅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流行语言的时局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现象，以阐明时局语交流现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传入中国的日制时局语

在引言中，提到近代中国接受了大量日制汉字词，鲁迅所言“拿来主义”也是这一现象的有力证明。“番号”正是流入中国的日制时局语的代表之一。

“番号”在现代日语中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的词汇，如“电话番号”“郵便番号”等。《日本国语大辞典》对它的解释为：表示顺序的符号，它是一般性的词。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却只表示“部队的编号”，是军事用语。产生这种语义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番号”这个词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创造的。“番号”最早出现于1881年日本明治初年的政府公文之中，当时的词义是“序号”。从那之后，直到今天，日本方面“番号”的词义没有发生变化。它一直被作为英语单词number的译词使用，是一个一般性名词。既可以指部队的序号，也可以指其他任何领域的序号。

“番号”在日本被创制之后，通过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士子和以《申报》为代表的报纸的介绍，进入中国。中国的第一例出现于1887年的《申报》，这时它的

词义用法和日本方面没有差别。这种词义（即“号码”）虽然直到今天尚存，但使用频次极少，主要出现在科技术语中。

1918年前后，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番号”开始被大量用于军事方面，使用量远远压倒它的本义（即“号码”）。在之后几十年的战争时局的强烈影响下，它渐渐变成了特指“部队的序号”的词，并最终作为军事用语沉淀在现代汉语之中。与日语相比，它的词义和适用范围缩小了很多。也许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号码”已经非常普及，通过战争途径传入的“番号”，只在军事领域被需要。因为其他领域已被“号码”悉数占领，并没有“番号”的立足之地。

二、传入日本的中国时局语“工作”

如上文所述，近代中日间词汇的交流是相互的。上一节笔者论述了日本制造的“番号”在近代战争年间流入中国，最终词义范围缩小，定格为汉语的一个军事用语。这一节，将阐述与其完全相反的词汇交流现象。

以“工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时局语，流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工作”是中国制造的，多见于古代诗词典籍，属于中国古典词。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日本并成为大为流行的时局语。日语中的“工作”最早出现于昭和2年（1927年）的关于中国的文献中，真正流行起来是上海事变（1932年）以后。

日本当时《大日本国语辞典》对于“工作”的释义有二。第一义，指肉体劳动或者机器作业，这是具体的意义。这一词义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国古典词义。第二义，指精神的活动，即订立某个目标、计划或政策，以及为达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活动

或运动。这是抽象的意义，来自近代中国。由于人的精神活动往往要和实际动作相结合，所以抽象的第二义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实际作业的部分占了上风。“工作”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泛滥现象，可以看作是第一义的扩张。它不仅大量出现于报刊杂志，更被用于日本语言学和国语学的书名和论文中。报刊杂志上也有很多文章大量使用“工作”一词，这些文章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教育方面。在数量上，第二义的出现次数则远远多于第一义的。它的出现有时甚至不表示任何意义，它的作用是给文章营造出一种氛围。比如“准备工作”，这里“工作”有后缀的性质。“工作”在日本的流行，显然受到当时中国流行的时局语“工作”的影响。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交流的工具。“工作”在日本的流行不仅是上海事变巨大影响的真实反映，更体现了1935—1936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之下，日本民众生活的反映。

三、时局语的词义扩张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很多战时的军事用语进入了日常生活中。

典型的例子有“动员”。“动员”原本是指：军队所采取的征召预备役的措施，其目的是从平常编制转为战争编制。但是，在国内严峻的时局下，国民的一切都被“动

员”了。在日本，1983年，《国家总动员法》上台；1943年起实施的“学生出阵”也叫“学生动员”。同年，在“劳动动员”的要求下，中学以上的学生不得不在工厂等地从事相关劳动。

即使我们不曾察觉，但是以“动员”为代表的一系列军事用语，早已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工作、生活语言之中，一直被沿用至今。从词汇学角度来说，这是词汇意义的扩大。

四、结语

以上，笔者论述了几类时局语。它们有的是日本制造，后传入中国的；有的是旧词新用，在中国流行后传入日本的；有的词义扩大了；有的词义缩小了。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时代词。每当提起这个词，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可以说，这样的词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语言标志。比如，说到“商鞅变法”就让人联想到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变革时期；提起“发展才是硬道理”，就能联想起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

生活在当今安定、幸福的年代，人们往往会更多关注一些新事物、新产品的词汇，对曾经的流行词逐渐淡化。实际上，词汇的演变自有其规律。今天，站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的历史交汇点上，

对时局语的词史研究有助于中日友好语言交流，取长补短，实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锦上添花！[阅读原文](#)

参考文献：

- [1] 平岡伴一. “工作”という流行語 [J]. 外来語研究, 1935, 3(1).
- [2] 平岡伴一. “工作”に関する追って書き [J]. 外来語研究, 1935, 3(2).
- [3] 森正俊. 支那語に入った日本語 [J]. 外来語研究, 1934, 2(3).
- [4] 森正俊. 支那辞典に出た日本語と日本字 [J]. 外来語研究, 1935, 3(1).
- [5] 榎垣実. 日本外来語の研究 [M]. 大孤: 大阪青年通社, 1943.
- [6] 桜井隆. 戦時下の日本語 [J]. 日本語学, 2017, 36(12): 118-128.
- [7] 沈国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作者：秦雅薇，女，1994年生，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教育研究科，外国语教育学专业。

